

郴县文史

(征求意见稿)

第四十五期

政协湖南省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三日

执着追求 勇敢开拓
回忆父亲陈梅朋艰辛的科研道路
陈景松 陈一如 陈大千 陈少梅

我们的父亲陈梅朋在人生的道路上，艰难跋涉几十年，直到新中国建立后，才得以施展才华，成为著名的食用菌学专家、野生菌种分离驯化科学的奠基人、上海食用菌研究所第一任所长，为人民作出了有益的贡献。

曲折的道路

父亲陈梅朋，原名陈鵬，1903年农历11月26日出生，祖籍湖南省郴县。祖父是当地的考官，父亲为庶出，祖母不堪忍受侍妾所受的封建主义压迫，终至悬梁自尽，死时犹

抱着父亲在怀里，不忍释手。父亲童年艰辛，在叔、姨家勉强生活，得以长大。十二岁即为学徒，过早地步入社会。后得肖子昂（字瑜，长沙修业学校教师，诗人肖三的哥哥）老师的指点：“你在中国当学徒，不如到外国去勤工俭学，方可造就成材。”他受此启发，毅然于十三岁之年（1916）要求赴法参加勤工俭学，这在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，出自一个少年之口，可称得大言惊人。此举感动了他叔叔、湘中南著名中医陈谊诚，连夸“有志气，有志气！”极力支持，并出洋二百元大洋作出国路费。在一个春雨潇潇的日子里，父亲告别家乡和亲人，只身赴京，参加留法勤工俭学乘船出国。同舟一百零八人，父亲年龄最小，船行至槟榔屿，有一华侨巨商怜其年龄幼小，万里出国，前途堪忧，建议他留在槟榔屿，华侨愿供其食宿就学，亦可成材。但父亲婉言谢绝华侨好意，立志西行，自己寻求出路，不愿寄人篱下。

父亲到法国后，先入李石曾创办的里昂中法大学补习法文，并在郊区一种植园充童工。与王若飞同学相友善，二人同居一室，做工时早上天不亮就起床，深夜才回家，往返几十里。回来后二人同洗一盆水，边洗脚，边吃饭，边读书，有时面包未啃完，即以手拭入睡。冬日夜寒，二人抵足而眠。后来，父亲以优异成绩升入著名学府巴德斯学院。

父亲学习勤奋努力，节假日都是在图书馆、实验室度过。外国人假日是不工作的，他就借来实验室的钥匙，可以充分自由地做实验。他的学习精神受到老师和同学的称赞。结业时以《中国油漆》为题完成毕业论文，获得硕士学位。其后又到德国深造，专攻园艺。获得德国莱比锡学院院长的青睐，以其爱女许与父亲为妻，生二子。

女。后欧战爆发，德国夫人携子女返德，病故于甲沟炎引起的破伤风感染。其子女即失去联系，唯遗其童年的照片于父亲处。

父亲曾因在法国参加学潮而被遣送回国。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，河南农学院院长。二度出国是应聘任中华民国驻德国大使馆雇员（翻译），二次大战前离职回国。1937年抗战爆发，在江西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特训班农业总教官（未授军衔）。1938年任四川成都国民党中央军校外语教官。与军校特训班交通总教官首凤标之女首弟顺结婚。1939年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残废军人生产事务局副局长、科长。1940年在四川任国民政府农林部下属国营农场场长。1942年离职，在重庆与友人合作办卷烟厂，至1945年因外烟倾销市场而破产停办。抗日胜利后，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沈阳印刷厂厂长。1948年东北解放，父亲南下至上海。任中正中学教员，兼教务主任，直至上海解放。

父亲在北京大学任事时，曾集体参加国民党组织，后拒绝登记，自动退出了国民党。

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期间，王若飞随毛泽东主席到重庆，曾到我家探望父亲，作了长谈，并邀请父亲去延安工作。父亲此时正经营卷烟厂，答应去延安。后因4·8飞机失事，王若飞不幸故世，父亲延安之行未能实现。

父亲幼年生长在湖南郴县一个落后的山村，对中国农业的落后和农民的贫穷有亲身的感受，因而从青年时代起，就立志于农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，在留学法国和德国期间，攻读生物和农业各学科，从微生物、真菌到农作物、蔬菜、果木、园艺，掌握了丰富的知识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年仅廿四岁就在德国获副教授职称。抗日战争

爆发后，父亲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，毅然回到祖国，希望以所学的知识，提高农业科技水平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，对拯救祖国有所贡献。但由于国民党腐败和连年战争，父亲的所学知识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，只好蹉跎岁月，无所适从。走过廿多年曲折的道路，最后一无所成。

蓬勃的新生

1949年，上海市解放，父亲从此获得了新生。该年12月他参加革命工作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开始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道路。他先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处第一科任科员，后随着国家建设需要，组织上根据他的专业特长，调入农业系统工作，先后任上海市国营新市农场技术员，上海市郊区办事处技师，上海市农业试验站技师，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第一任所长、副研究员，上海市园艺学会副理事长。并被选为上海市第二、第三届人民代表。1956年参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。只有此时，父亲多年梦寐以求夙愿才得以实现，所学的知识才能得以充分施展。他青春焕发，精神振奋，工作积极，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从事农业科学研究，挽回逝去浪费的岁月，为振兴祖国多作贡献。

父亲调农业系统工作后，先是从事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。1957年成立上海农业科学院，父亲转而从事科学研究。从出任食用菌研究所所长到1968年去世的短短十年里，父亲执著追求，勇于开拓。在科研道路上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突破。研究成果经国家鉴定的有：与孙超合作的“猪、牛粪代替马粪栽培蘑菇”；与陈敬荣等合作的“猴头菌栽培技术”；与孙华瑞等合作的“银耳菌种分离及

其栽培研究”，此一成果获1978年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奖；与陈国良等合作的“灵芝的栽培及其应用”。发表的研究专著有：《蘑菇与草菇》（发行单行本）、《怎样种向日葵》（发行单行本）、《银耳菌丝体分离培养菌种的研究》（载《上海农业科技》1979年第一期 未发表的有《食用菌栽培学》、《食用菌生理生态学》（均已完成初稿）和《中国野生菌图谱》（完成调查大纲），在文革中均被抄没，至今不知下落，实在是重大损失。

父亲在农业科学方面的研究范围很广，其最突出的成就在于：

1·发明了以猪、牛粪代替马粪栽培蘑菇新技术，解决了从栽培料制造、原孢子分离、菌种制种直到栽培管理等一系列蘑菇栽培技术问题，使蘑菇生产在全国城乡得到空前发展，为提高农民收益，增加国家换汇资源，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。

2·研制成功了食用菌栽培新技术，除蘑菇以外的香菇、银耳、草菇、木耳等食用菌人工接种和栽培成功，扩大了食用菌的人工栽培种类。

3·为野生菌分离驯化制种的研究，从基础理论到操作技术奠定了基础，对猴头、灵芝、紫牛肝菌、鸡米菌等几十种名贵野生菌分离驯化成功，使过去曾是珍稀滋补品的银耳、猴头和被神化的灵芝，都已能大量人工栽培生产，为发展我国营养食品和中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4·十多年来，为上海市郊区和全国十多个省、市培训了数以万计的食用菌栽培技术人员和菇农。在他六十二岁高龄的时候，还远行峨眉、武当等高山和内蒙、黑龙江、江西、福建等省、市仁寿

源调查，巡回讲学，传授辅导提高食用菌栽培技术水平。

5- 探索试验水稻旱种法，为改变中国水稻传统耕作方法独辟蹊径，为提高粮食产量探索一条新的道路，并取得初步成果，可惜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使这一大有希望的研究中途夭折。

一 党和政府对父亲非常器重和信任，委以重任，并充分支持他的工作，使他的一系列学术思想和科学研究得以实现。国家三年困难时期，市政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，拨巨款建造食用菌实验大楼。在党员干部纷纷降薪下放的时候为他晋级增资，并在工作条件和生活上给予充分照顾。1958年，李立三同志在上海接见了父亲，共叙留法勤工俭学时之情谊，并对他解放后的科研工作给以高度评价。所有这一切，使父亲感激涕零，不顾年老多病之躯，日夜勤奋工作，以报共产党知遇之恩。

艰辛的步履

父亲治学极为严谨认真，一丝不苟。他知识渊博，基础扎实，思想活跃，敢于创新，一向不为传统习俗所束缚，不为流言蜚语所阻吓，为了事业的成功，不顾个人利害得失，一旦认准方向就一往无前，孜孜追求，决无反顾。这是他在事业上获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。他在科研道路上步履艰难，艰苦奋斗的精神，从以下几例可见一斑。

1- 关于发展城市种蘑菇的辩论

五十年代初，我国农产品主要是粮、棉、油、菜，不仅产量低，而且价格低，农民辛苦一年，收入甚微。当时父亲在上海农业试验站工作，目睹这一情况，常苦苦思索：如何扩大生产门路，增加农

民收入？他在对各类作物分析比较后，认为蘑菇的价格是蔬菜价格的几十倍乃至近百倍，又不与粮、油争地，且可为农业提供大量有机肥料；郊区依傍大城市，有广阔的销售市场。因而向领导提出了大力发展蘑菇生产，促进农业发展，提高农民收入，满足城市需要的设想，不料却引起许多非议和责难，主要意见有：蘑菇价格高昂，只有资产阶级老爷才能享用，种蘑菇是为资产阶级服务；种蘑菇要用马粪作栽培料，上海无马，种蘑菇是异想天开。一下就把学术问题上了纲。父亲对此毫不理会，并针锋相对地指出：蘑菇价格高，是由于物以稀为贵，只有发展生产，才能降低价格，打破资产阶级享用蘑菇的专用权；马粪是一种良好的蘑菇栽培料，但强调非马粪不行，则是一种偏见，有必要开展代用料的研究，以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，并自告奋勇限期完成该项研究任务。市政府领导支持父亲的意见，把研究任务交给他，只用两年时间，就成功地解决了以猪牛粪代马粪作栽培料、单孢子分离、菌种制种等发展城市蘑菇生产的关键技术问题，使上海郊区的蘑菇生产面积由1957年的五千平方米，猛增至1959年的六万五千平方米，两年增加十二倍多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2·放弃出席哥本哈根国际蘑菇生产会议

1960年，父亲收到国际蘑菇会议的邀请书，指名邀请他出席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蘑菇生产技术研讨会。当时正是西方对我国封锁最严的时期，吸收中国学者参加国际学术活动的机会是十分罕见的，从市政府到外交部对此都十分重视，专门请父亲一同商议如何赴会和发言的问题。能有如此良机进行国际联系和学术交流，父亲在接函之初也是十分高兴的，但在仔细分析了会议讨论大

纲目录后，发现我国在蘑菇生产技术上已大大超过当时的国际水平。例如议题之一分析讨论马粪素对蘑菇生产的影响，选用何种马粪（拉车马、赛跑马、耕田马等）最好？而我国早已研究成功以猪牛粪，甚至鸡鸭羊粪代替马粪的高产蘑菇栽培技术，根本不再需要研究马粪素的影响问题。会上还列有孢子分离技术的议题，表明当时国外还在研究这个问题，而我国则早已解决。根据上述情况，父亲认为如在会上宣布我们的最新成果，固然可提高我国食用菌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，但关键技术的流失，必将对蘑菇出口市场造成不利后果；若缄口不言，则表示默认我国尚未发明上述新技术，丧失最早的发明权，父亲权衡利弊，认为此行弊多利少，不去为宜。中央和市政府领导十分赞同父亲的精辟分析，同意他放弃出席会议的建议，并对他以国家利益为重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和赞扬。

3. 关于水稻旱种的试验

父亲晚年注意研究如何提高粮食产量的问题。水稻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，种水稻需水量大，在许多缺水地区，尤其在北方不宜种植，限制了水稻面积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。他对水稻生长发育的基本机理进行科学分析，看到水稻的特点是在一定的生育期需要较多的水分，并不必要整个生长期都浸泡在深水中，更不是水越多越好。改革传统耕作方法，实行水稻旱种，好处一是节约用水，可在缺水地区大量扩种，增加稻谷总产量；二是根据稻苗不同生育期，有控制地灌水，既满足其需水的特点，又克服长期水泡的危害，增强土壤透气性能，促使稻苗根系发达，根深才能秆粗叶茂，才能增强耐肥抗倒伏、抗风、抗病害的能力，有利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。

水稻旱种从理论上分析是对的，实践是否可行必须通过试验，父亲认为开展该项试验研究至关重要，在他六十五岁高龄的时候，向农科院提出了建议，并自愿担负试验研究任务。不料这建议一经提出，即遭到强烈反对，有人讽刺父亲完全不懂水稻习性，外行讲外行话；有人则说父亲是标新立异，哗众取宠，想捞取资本等。父亲顶住了这些冷嘲热讽，得到了上海农业科学院主要领导人的支持和信任，拨给二亩田，由父亲和一位农业劳模按各自的方法耕作进行对比试验。

父亲以蘑菇研究权威的身份去种水稻，与种了一辈子水稻的老劳模争高低，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，其胜负结果也令人生畏，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，知识分子胜了贫下中农，难免不无限上纲，失败了更会身败名裂。多数人对父亲此举极不理解，父亲则毫不顾及后果，一心想闯出一条水稻增产的新途径。他不顾自己身患哮喘、肺气肿多种疾病，从早到晚亲自耕耘，在烈日下播种、施肥，赤脚下田除草、采集标本，挥着长杆赶麻雀，按照科学理论制定的水肥管理方案，又不断根据作物生长状态和标本检验结果作相应的调整，不断修改，充实、完善。他全身心扑在这亩试验田里，有时经月不回家。无论是谁，尽管不赞同他的观点，也不能不钦佩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。

父亲一年的辛勤劳动，取得了预期效果：采制的标本比较表明，旱种水稻根系发达，其主根比水田稻苗深一至二倍，茎秆粗壮有力，病虫害明显下降，施肥水平提高一点五倍，在台风期无任何倒伏，各生长期发育正常，各种设想不断得到验证。收获结果，旱种亩产超过水田一百多斤。第一年试验就获得成功，父亲对此充满信心。

正当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制定新的措施，准备来年继续试验深入研究之际，不期阴云四起，有人提出父亲的对比试验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向贫下中农挑战，试验田产量超劳模是砍红旗……无限上纲，一场学术争鸣居然被歪曲成政治斗争，一颗为国为民之心被歪曲为别有用心。迫于当时形势，原支持父亲试验的院领导也只得以照顾健康为由，要父亲中止试验。在后来批斗父亲的时候，这是父亲的重要罪名之一。几十本精心制作的标本被践踏，试验计划、总结被销毁，父亲对此痛心疾首，一直急切地盼望风暴快点过去，好让他在有生之年继续完成这项试验研究，他认为这一研究课题如果成功推广，比他十年的食用菌研究更具有战略意义。

4. 在撰写学术著作的道路上

父亲从青年时代起，即立志献身科学。年仅十三岁远度重洋出国求学，虽学有大成，解放前却一直无法施展。在他能够大显身手的时候，已年近花甲，两鬓花白了。任重道远，父亲十分珍惜时间，每日里不是早出晚归紧张地试验研究，就是通宵到旦地伏案疾书。他要在有生之年，尽力为祖国建设多作贡献，还要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经验记录下来，传给后人。

六十年代初期，父亲指导下的食用菌研究进展很快，不断涌现高水平的成果，日益显示其在农业和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，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，他认为有必要从基础理论到栽培技术，编写一部完整的著作，以便作为专门技术人员培训和栽培技术普及推广的教材。父亲当仁不让地把这项任务揽下来了，作出宏大计划写成三部巨著：《食用菌生理生态学》、《食用菌栽培学》和《中国野生菌图谱》。他边试验，边调查研究，边总结撰写，抓紧时间进行。

1960年，陈赓大将在上海接见父亲，两人作了亲切长谈。陈赓大将对食用菌研究成就作了高度评价，同时提醒父亲：“你已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不要把满腹学问带去见马克思，要带好接班人，尤其要把亲身经验体会记下来。哪怕影响一点工作，也要把著作写出来，传下去，造福后人。”由于当时许多栽培技术对国外保密，著作不能公开发表，陶赓同志希望父亲为了国家利益，甘当无名英雄。

院领导对父亲的写作工作也十分关注和支持。1960年，让父亲放下手上的一切工作住进一套花园洋房，潜心著作。父亲在优越的环境中苦耕半年，完成了《食用菌栽培学》的“总论”和若干各论的草稿。本来领导希望他继续专心写下去，但他通过总结研究，又发现许多试验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，许多理论设想有待实践验证，而自己身体每况愈下，时不我待。因而提出暂停专业写作，趁目前身体还能活动之时，多做些调查研究和试验推广，写作放在业余时间进行。这样一直到“文革”之前，又赢得了五年时间，进行了大量的实验、研究和推广工作，六十二岁时，还远行四川、黑龙江、江西、福建等十多个省市巡回讲学，深入山区调查野山菌资源，取得了一批新成果，丰富了写作内容。到“文革”前夕，他利用业余时间，完成了《食用菌生理生态学》和《食用菌栽培学》两书初稿以及《中国野生菌图谱》（调查大纲）近百万字；同时还写成水稻旱种试验总结，制成全套水、旱两种耕作法各生长期植株生长发育的全部对比标本。并且在1963年6月市农科院召开的会议上，发表了《我对农业科学研究的一些意见》，在市政协第二届会议上

作为列席代表，与政协委员王鸣歧等作了《加强农业科学研究，为发展农业生产而奋斗》的发言：阐述了自己对农业科学的意见和建议，受到有关方面欢迎。

父亲治学态度极为严谨，写作目的、对象十分明确。例如他认为食用菌栽培学的对象主要是初入门者和农民，因而务必写得通俗易懂，浅显易懂。父亲将写好的每一章节，都要我们看过，并说：“你们是工科大学生，虽然实践知识比农民少，但文化水平比他们高，如果你们都看不懂，理解不准确，怎能要求农民看懂呢！”凡是我们不懂或不理解的地方，他都要反复修改，直到满意为止。《食用菌生理生态学》一书，是作为基础理论教材，要求有较高理论和学术水平，父亲在撰写该书时，翻阅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文献资料，务求追本逐源，有理有据。图谱则应以标本和实物照片为基础，力求深入山地林区实地考察去求得。

正当父亲以六十六岁高龄竭力与死神争时间，力争在生命之火熄灭之前完成历史使命之际，一场大风暴强行把他刮下角斗场，除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之外，更使他难以忍受的是资料文稿被抄，标本被毁，研究和写作的权利被剥夺。父亲心痛如焚，最后竟情急智生，借写“检查”之名，继续行学术研究写作之实。在1967年的4至6月间，先后写出了《我对食用菌工作的回顾和检查》、《我对食用菌今后工作几点不成熟的看法》和《为什么蘑菇高产出自新发展的菇房的新手》等“检讨书”，共一万多字，先把自己无限上纲地批判一通，然后对照毛主席的论述，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工作意见。把检查部份删除，就是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。父亲以找到

这一工作方法而感到高兴，精神又有了寄托，使生命之火继续燃烧了一年多。直到1966年5月，父亲被完全隔离审查，最后一点与家人团聚和以此方式工作的权利被完全剥夺，才感到完全绝望，决心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作为一个正直的人的尊严。

粉碎四人帮以后，农科院党委很快对父亲的问题进行了复查。于1978年9月16日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，报上海市革委会农办党组批准，宣布平反，恢复名誉。10月14日，在龙华殡仪馆举行了隆重的‘陈梅朋同志追悼大会’，市科委副主任张文韬、市农业局局长陈玉华、市革委农办副主任邵晋藩、市农科院党委副书记纪乐天、崔玉光等同志及市农林口、郊区农业部门的干部、职工三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。市农科院副院长储斯同志主持大会，园艺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毛佃琛同志致悼词，高度评价了父亲的一生，并号召大家学习他拥护共产党，跟着党前进的革命精神；学习他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，学习他热心科学，努力从事科学研究的勤奋作风。在伟大的共产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，父亲的冤案终于得到平反昭雪，使先人含笑于九泉，更激励我们子女坚信共产党的领导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决心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祖国而贡献力量。

1990年10月25日

作者简介：

陈景松 陈梅朋长子，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，现任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。

陈一如 陈梅朋长女，北京石油学院毕业，现任南京炼油厂技
校讲师。

陈大千 陈梅朋次子，上海交通大学毕业，现任上海电机技术
研究所副所长，工程师。

陈少梅 陈梅朋次女，上海区教育学院毕业，现任上海新华路
幼儿园教师。

